经济学基本问题与当代经济学思想谱系
——三大经济学范式的思想本质与相互关系

鲁品越,王劲松
(上海财经大学 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　要:不同哲学立场将引致不同的经济学基本问题,由此将发现不同的经济机制,形成不同的经济学理论范式。以个体经济行为的“欲望与资源的矛盾”作为经济学基本问题,发现了市场的“边际利益均衡机制”,诞生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再生产流程问题”为经济学基本问题,发现了社会再生产流程的“货币流量机制”,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力量的根源和本质”作为经济学基本问题,导致了对资本的历史运动规律的发现,诞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三种理论范式构成了当代经济学思想谱系,它们应当相互补充,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层面。

关键词:经济学基本问题;经济理论流派;经济机制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0)03-0025-11

经济学是派别林立的争论王国。有人把各种流派归源为三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了 100 多年来经济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①] 此论并不周全,因为似乎没有把熊彼特等非主流学派包括其内,但就经济学理论的哲学思想渊源来说,100 多年来对全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主导性理论范式的确可总体上归结为这三类。那么对同一社会经济研究对象为什么会产生出三种迥然不同的理论?如何评判三者的是非曲直?三种理论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纷争?这是长期困扰经济思想界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三大理论范式的学理层面的发端点乃是它们各自的哲学基础不同,由此导致其分析与解答的“经济学基本问题”不同,进而分析不同的经济过程,发现不同过程的经济机制,生成不同理论,而这些问题的交界领域则构成了它们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地带。因此厘清这三大经济学理论的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及其所要回答的“经济学基本问题”之间的差异,对于把握这三种流派的理论实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而从整体

收稿日期:2009-11-19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课题资助项目(09YJA720021)
作者简介:鲁品越(1949—),男,安徽芜湖人,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劲松(1971—),男,江苏沭阳人,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上把握当代经济学理论谱系,至关紧要。

一、利益-资源问题与利益均衡机制的发现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主题

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文化,由此产生的抽象人性论成为文艺复兴后的主导性哲学思想,而其中直接影响经济学理论的是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的功利主义。在这个文化土壤与哲学思想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学,很自然地成为关于个人经济行为的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歇尔指出,“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而另一方面,经济学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是关于人在社会当中的行为,研究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付出的努力”,[②]简言之,他认为经济学是关于人在财富方面的行为的科学。这样的经济学必然以个人利益及其付出的成本与代价作为其基本问题。国内一本较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个人和团体从事生产、交换以及对产品和劳务消费的一种社会科学,它研究怎样最佳使用稀缺资源以满足人们无限的需求。”“在这个定义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概念有两个:一是‘稀缺的资源’,二是‘无限的需求’”。[③]如果这的确代表了学界对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基本问题”的表述,我们认为必须做出如下的修正,才能真正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本身:

第一,“无限欲望”中的“无限”一词是多余的设定,并未用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推演过程中。实际上,即使欲望有限,只要受到资源的约束,就能推导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此外,如马歇尔所说,在人的多种多样的欲望中,只有关于财富的欲望才构成经济行为,其他欲望(如政治欲望、伦理欲望等等)只有转化为财富欲望以后才可以成为经济学研究对象。所以应当将上述表述中的“无限欲望”改为“财富欲望”,才会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建构中真正起作用的概念。第二,进入新古典经济学推导过程的,并非资源本身稀缺,而是行为者拥有支配权的资源的稀缺。第三,“经济行为者”主要既指个体也指群体,但该群体必须是具有统一意志和权力的主体(法人),否则无法进行利益与资源的理性配置。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中真正起作用的“经济学基本问题”,不是简单的“人们的无限的欲望与稀缺的资源之间的矛盾”,而是“具有统一意志的经济行为者(个体与法人)的财富欲望与其拥有支配权的资源的约束之间的矛盾”,本文简称为“欲望与资源的矛盾”。以此作为经济学基本问题,必然产生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范式。

首先,一旦确认“经济学基本问题”是“欲望与资源的矛盾”,就必须对该经济行为者处理这个矛盾的基本原则作出假定以作为其理论的立足点。于是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行为者总是在其具有支配权的资源约束下力图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正是以此假设为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具体分析了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它包括下述两个层次：

第一是经济行为者层次的“边际均衡”状态。既然经济学基本问题是“欲望与资源的矛盾”，理性经济人应当将其经济行为分解为一步步行动单元，对每一行动单元所获收益（边际收益）与所付成本（边际成本）进行利益比较，使每一步都“得大于失”，直至二者相等的“边际均衡”为止。在此基础上，再研究各种因素的变化（如价格、收入等等变化）所引起的边际均衡点的变化特征，得出各种关于这个边际均衡点的弹性（需求弹性、供给弹性）理论。将这一套基本的方法论原则用于分析各类经济行为者的行为，于是得到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要素供给者理论等等。

第二是理性经济人之间的市场均衡态，包括“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在处理“欲望与资源的矛盾”中，各个理性经济人之间通过交换其可支配的资源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由此趋向于局部均衡的“帕累托最优”——各方达到其资源约束下的利益最大化状态。但是，各个市场的局部均衡又必须以其他市场的“既定价格”为前提：产品市场的局部均衡必须以要素市场价格既定为前提，而要素市场的局部均衡又必须以产品市场价格既定为前提，由此陷入逻辑循环。那么是否存在着所有市场同时实现均衡的“一般均衡”？经过从瓦尔拉斯到阿罗、德布鲁的一系列理论努力，终于证明：在一系列苛刻条件的限制下，通过大规模讨价还价过程，全社会市场可以趋向于“一般均衡态”，但这必须在一个没有股市、没有企业破产、货币对资源配置没有实质的影响的经济体系中才有可能。[4]

由此可见，新古典经济学正是以“欲望与资源的矛盾”作为经济学基本问题，以利益驱动力作为经济体系的基本动力，发现了市场的“边际利益均衡机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它的最初形式，而边际分析及其“帕累托最优”则使其精确化，它们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然而上述理论对于“欲望与资源的矛盾”的发生情境与处理方式过于简单，具有许多理论缺陷。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些具体过程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学理论，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等等。它们本质上只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深化与延伸，即承认人们在利益的理性算计中需要考虑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信号传递成本、他人决策的影响等因素。然而，“欲望与资源的矛盾”仍然被视为“经济学基本问题”，“理性经济人”假设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基本假设，因而其仍然属于新古典经济学流派。

因此，只要以“欲望与资源的矛盾”作为经济学基本问题，所建立的经济学只能是新古典经济学。它成为当今经济学界的所谓“主流经济学”，甚至被某些人奉为唯一正确的经济学。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有人提出：人们未必“自利”，在有些情况下也会“利他”，因而企图用“利他主义”假设来批评与替代“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假设。但是“理性经济人”假设

并不会因为这一批评而被推翻,因为它只是用一种抽象人性论(利他主义)来攻击另一种抽象人性论(利己主义)。还有人认为人们即便自利,也没有理性能力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新古典经济学维护者可以作出以下辩护:经济学理论目的不是导出与现实完全一致的结果,而只是描述现实经济所趋向的目标状态。因此,所有这类批评都没有抓住本质。实际上,只要奉行个人主义哲学,认为社会经济体是由一个个作为原子的个人组成的,从而个人处理"欲望与资源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就无可避免地要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无可避免地对利益与成本进行"边际分析",从而无可避免地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理论。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要害问题不是"利己"还是"利他","有限理性"还是"无限理性",而是下述根本的哲学立场问题:社会是不是作为原子的个体的集合体?因而个人面临的"利益与资源"的矛盾到底是不是"经济学基本问题"?

深入的研究发现:由于社会并非简单地作为原子的个体的集合,所以"利益与资源"的矛盾问题虽很重要,然而毕竟只是经济行为者面临的基本问题,并非全部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在经济行为者的背后,还存在着更加基本的问题。随着人们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人们便越来越深刻地发现社会经济系统的深层机制,创立了新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二、再生产流程问题与"货币流量机制"的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题

生活在大萧条时期的凯恩斯关心的经济学基本问题已经不是"欲望与资源的矛盾",因为萧条的社会经济体中存在着大量闲置生产要素,资源稀缺性已经不再直接构成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社会所缺乏的是推动这些资源进入再生产流程的运行动力,而这种动力系统正是货币流量系统:因为货币流通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循环的过程:货币以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的形式从企业流入社会;当社会大众购买商品、消费劳务时,这些钱又回流企业。只要企业卖出他们所生产的产品并获得满意的利润,这一过程就会维持下去。"⑤那么,推动社会再生产的货币循环流程是如何运行的,这才是凯恩斯所关心的经济学基本问题。正是对它的分析和研究,凯恩斯发现了有别于"利益均衡机制"的经济机制——社会经济再生产的"货币流量机制"。凯恩斯并非哲学家,其理论的哲学基础并不明显,所以后来的"两个剑桥学派"就此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是,综观凯恩斯理论的思想实质,可以发现其哲学基础是:不再仅仅把市场经济系统看成简单的个体集合,而是看成用货币流通体系组织社会再生产的机器。凯恩斯发现了这部市场机器的缺陷,并提出用政府权力来加以矫正。

凯恩斯之前的经典学派也研究过再生产过程中的货币循环机制,这就是

总供给转化为总需求。然而它将“欲望与资源的矛盾”视为经济学基本问题，认为“利益均衡机制”是最根本的经济机制，由它必然会产生出再生产流程的“流量均衡”（总需求总是等于总供给），此即著名的萨伊定律。从根本上说，按照“利益均衡机制”，当劳动所创造的边际供给（收入）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等时，社会的就业量达到最大化，由此产生了社会最大总供给，而人们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驱使最大总供给全部转化为满足人们欲望的总需求，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的均衡态。因此，一切失业都归结为两类：劳动的边际收入小于劳动负效用的“自愿失业”，以及摩擦性失业（某部门的失业量必然等于其他部门的缺员量），不存在总量上的“非自愿性失业”。然而这种理论完全不符合事实。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不断发生全局性产品过剩危机和总量上的失业，而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迫使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家要寻找萨伊定律的错误所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由此问世，一种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流派的新经济学由此诞生。

萨伊定律错在哪里？说到底，是只考虑微观层次的利益均衡机制，而忽视了宏观再生产流程中货币循环体系的流量机制。凯恩斯高屋建瓴地分析了穆勒、马歇尔、埃奇沃斯、皮古等“经典学派”代表人物对萨伊定律的各种论证，发现他们都是以“实物交换”的利益均衡机制为根据的，忽视了货币流量的独特作用。凯恩斯指出，在经典学派那里，“除了引起若干摩擦阻力而外，有没有货币，没有多大差别；像穆勒一样，经济学可以根据实物交换情形，完成生产论与就业论，然后再敷衍塞责，引入货币——这就是经典学派传统之现代说法。”[⑥] 然而在货币流通机制下的经济活动，与没有货币、或货币仅仅是实物代用券的经济活动具有本质区别，因为货币流量改变了人们争取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不是“边际利益均衡”产生“货币流量机制”，而是货币流量系统决定人们利益行为。于是货币流量系统的运行机制问题成为凯恩斯所要研究的“经济学基本问题”。

货币虽然早就出现，但早期的货币仅仅是一种实物交易的配角，“是用来便利交易的一种技术装置”，[⑦] 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化的货币流通系统。而在独立的货币经营机构（银行、钱庄等等）出现之后，货币除了交易功能之外，还获得了独立于实物交易的存储、借贷、生息、投资、投机等由实物交易衍生而来的功能。于是在社会实物生产与交换系统之外，出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货币系统，这个系统的功能不是进行实物生产，而是提供推动社会实物再生产系统的社会动力。于是社会的实体经济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实物生产和交换部门（产品市场），二是推动实物生产的社会动力系统——货币流通系统（金融市场）。这反映在宏观经济学的“IS－LM 模型”中：IS 表示产品市场的均衡，LM 表示金融市场的均衡。注意：这里的货币系统并非虚拟经济，仍然属于实体经济领域，因为这里的货币价值仍然是实物经济的价值，它由实物生产过程所决定，而不是像虚拟经济那样，资产经过证券化之后，其资产价值由人们对其未

来增值能力的预期所决定。

于是,在使用货币的系统下人们的经济行为遵循“凯恩斯三定律”:货币的储藏功能诱导人们进行储蓄而减少消费,由此产生“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定律”,使投入消费的货币在收入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小;资本的生息功能使投资付出了机会成本,由此产生了投资行为的“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定律”,它决定了投资总额的界限;货币的投机获利功能决定了储蓄利率的下限,由此产生了储蓄行为的“流动性偏好”定律。三者的总结果是:社会生产的总供给流量中只有一部分投入于需求(消费与投资)而进入再生产流程,其他部分被储存起来而退出再生产流程,造成部分再生产流程无法继续。而能够再生产出来的实际产值(总供给)由那些转化为需求的货币流量(有效需求)所决定,它小于由劳动的负效应所决定的总供给(它是社会经济系统的最大可能产值),二者之差构成“有效需求不足”,这个缺口所对应的就业量,就是“非自愿性失业”的数量:即在劳动边际收益大于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的情况下的失业。这种失业显然是“利益均衡机制”所无法解释的,而且“社会愈富,则其实际产量与可能产量之差别愈大”。[8]

既然市场机器必然会发生货币流通量不足所导致的停滞与衰退,因此必须依赖市场外部的政府力量将未能自动转化为需求的、退出再生产领域的产出重新投入到总需求中:这就是使用政府权力将那些储存起来的货币通过税收与债券等形式集中起来,以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经济系统的货币流量,给社会再生产提供动力。这就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或“财政主义”。凯恩斯进而证明:政府投入的初始流量可以带动社会的闲置货币投入市场,产生更大的货币流量,由此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推动市场机器的运行,此即所谓的“乘数效应”:“即总需求之增加,乃等于总投资增量与乘数之积,乘数则定于边际消费倾向”。[9]如果说,经典学派发现了“边际利益均衡机制”(“看不见的手”),凯恩斯则发现了“货币流量的动力机制”,它由“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国家干预主义”与“乘数原理”三者所构成,这是凯恩斯的主要贡献。

在凯恩斯之后,以罗宾逊夫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反对用边际利益分析来解释市场价格,而改用再生产的货币流程来解释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新剑桥学派所信奉的“斯拉法理论”。它认为社会商品生产过程实质上是“用商品生产商品”的流程,货币是组织商品再生产流程的手段。与新古典经济学把“理性经济人”作为经济学公理不同,斯拉法把“再生产条件”作为其理论基础,为此必须建立适合所有商品的一套交换价值,“如果市场采用这些交换价值,会使产品的原来分配复原,使生产过程能够反复进行”。[10]这套价格体系,能够确保任何商品的总产出所具有的价值,大于或等于其投入的各种商品的总价值。其超过的部分就是“剩余”,即简单再生产循环过程中可以溢出的剩余商品。由此可见,新剑桥学派的确继承了凯恩斯对货币流量的分析传统,将“社会再生产流程可持续进行”的条件作为经济学基本问题,将其取代边际利益分析来

解释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

三、资本力量的根源问题与资本主义历史运动规律的发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题

凯恩斯曾经指出,“经典学派不察,把从鲁宾逊·克鲁索经济体系中得来的结论,用错误类比法搬到现实经济体系中来应用。”[11] 所谓“鲁宾逊经济体系”是个体经济体系,其遭遇的“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确是“欲望与资源的矛盾”。然而它并非整个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因为无论是人的“欲望”,还是人们可支配的资源,都由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所决定。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12] 至于经济行为者可支配的资源,更由社会的所有权关系所决定。因此,在社会经济体系中,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生成的?如何起作用的?这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更基本的问题,它决定每个个体的“欲望与资源矛盾”的具体的现实形式。

凯恩斯比新古典主义前进了一步,不再把市场仅仅看成简单的个体集合,而是看成用货币流通体系组织社会再生产的机器。那么,货币的力量又是从哪里来的?其本质到底是什么?这是比“货币流程”更基本的问题。凯恩斯主张作为货币流量来源的社会总供给由社会的就业量所决定,这隐含着劳动创造总供给的货币流量的意思。但凯恩斯理论重心不在此,而在分析货币流程本身。至于货币流量的来源与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不是他要关心的问题,其后继者甚至将这个问题视为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加以排斥。

而能够回答上述问题的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风起云涌向全球推进的时代,资本力量是这种生产关系力量的表现,它既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又不断展示其内部根深蒂固的矛盾与危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十分清晰地指出了这种资本力量的巨大作用与深刻矛盾:“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3] 对此,具有伟大使命感的马克思创立了他的经济学理论,其主旨正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根源与历史趋势。

马克思发现,资本与货币的力量不是其载体——金银或生产资料本身的力量,而是负载在它们身上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力量。“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14] 因此,资本与货币的力量就是社会生产关系力量。

那么,这种市场社会关系力量的根源和本质如何?这正是马克思经济学所要解答的“经济学基本问题”。

这一经济学基本问题还可以换一种形式来表述。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曾经反复强调,资本与货币是市场上的权力。货币能够取代政治权力来配置社会资源,这意味着货币也拥有“权力”性能,我们称为“市场权力”,它来源于货币所负载的“商品价值”。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反复论述货币和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的思想。《资本论》第1卷至第3卷中(中文版)至少有19页直接提到商品、货币与资本的“权力”。[15]他清楚地指出,“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16]“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场上,只是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对立,他们彼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17]而这种权力的大小要通过货币来表现:“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18]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关于市场权力的来源与本质”的问题。

而解答这个“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哲学路线,正是唯物史观。马克思发现人类社会不是由具有抽象的“人的本质”的单个人的集合体(马克思将这种集合体称为“市民社会”),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劳动)所生成的人类社会(马克思称为“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9]因此,“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20]以这种唯物史观为基础,马克思彻底改造了以人性论为基础的旧劳动价值论,创立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新劳动价值论,从而为他的“经济学基本问题”提供了最根本的思想基石。

劳动首先是“自然过程”,即自然物的变换过程——将天然物质改造为符合人类需要的物质财富。而在社会分工条件下,为他人生产产品与服务的劳动(社会劳动)在生产物质财富的同时生产着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其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被他人所享有,从而将一种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凝结于其生产的使用价值中。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商品所负载的这种社会关系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通过市场交换劳动产品的经济结构中,社会劳动成为全社会进行交换的抽象劳动,由此生产出最基本的市场社会关系——“价值关系”。这就是说:劳动者在劳动中所消耗的生命凝结在其各自生产的商品中,形成了“价值实体”;各种商品的“价值实体”之间在市场中形成“价值关系”:“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21]这是市场结构中掩藏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它不断获得各种表现形式:在商品中表现为“交换能力”或“交换权力”,在货币中表现为作为购买力的“市场权力”,而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后,它则发展为“资本权力”——支配生产要素和劳动过程

进而分割剩余价值的权力;在土地所有制下它表现为分割剩余价值所形成的地租,如此等等。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资本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支配全社会经济运行的社会关系力量。在此基础上,《资本论》分析了作为社会关系力量的资本在追求自身扩张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强大动力及其内在矛盾,以及由此生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历史运动,这正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

四、“三层次问题”与“三层次发现”的理论地位

因此,以个体的“欲望与资源的矛盾”作为“经济学基本问题”,发现了“边际利益均衡机制”(用边际分析方式表述的“看不见的手”),产生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以“推动社会再生产流程的动力”作为“经济学基本问题”,发现了“货币流量的动力机制”,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而由资本代表的生产关系力量的产生根源和本质作为“经济学基本问题”,则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规律”,产生了以劳动价值论的分析范式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那么,这三种经济学理论范式及其理论结果到底具有怎样的定位?三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我们承认,这三大流派所研究的“经济学基本问题”是市场经济在不同层次所面临的问题,因而所发现的经济机制是不同层次的经济规律的近似表现。首先,利益与资源的矛盾的确是人类社会的微观的经济行为主体所面临的矛盾,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所发现的“边际利益均衡机制”及其描述的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规律,是微观层次的个体经济活动的规律。这个规律所描述的均衡态虽然不可能是现实的经济状态,但是在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既定的情况下,它指出了市场价格体系的趋向。然而,人们在处理“利益与资源”的矛盾时,利益与资源的具体形式却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取决于人们在特定生产关系下所掌握的“市场权力”,它通常用货币的形式来表现。因此,价格形成过程归根到底是人们利用所掌握的市场权力进行利益分配的过程。如果我们要在理论上追根求源,则必须追问:这些市场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它们来源于哪里?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因此,市场上个体行为层次的“边际利益均衡机制”应当建立在深层的“市场权力产生机制”之上,建立在由这种“市场权力机制”所产生的“社会货币流量机制”之上。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

凯恩斯经济学所发现的“货币流量机制”是社会再生产流程的规律,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层次的规律作出了许多新的发现。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对市场的国家干预主义和乘数原理,各种货币流量公式,以及政府赤字的挤出效应等等关于宏观经济流量的规律,的确具有不同程度的真理性,当今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从长期的历

史进程来看，宏观货币流量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中社会关系力量的宏观表现，“货币流量均衡机制”本质上是市场中社会关系力量市场博弈的结果，其根子是资本扩张过程及其面临的基本矛盾。因而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入分析上才能得到根本的理解与把握。在当今世界，这种生产关系力量生动地表现为各个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国际资本力量的博弈、劳动与资本的博弈等等。正在发生的金融风暴表明：由当代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资本扩张运动是整个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离开实体经济的资本增值，离开以资本增值预期为基础的虚拟资本的流动过程，无法真正深刻而全面地揭示当代金融系统的运行机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给我们分析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力量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因此，这三大流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当代市场经济体系最深层的规律，它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其他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这是因为当代人类一切经济行为与社会经济现象——不论是新古典主义所研究的经济现象，还是凯恩斯所研究的经济现象，都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而当我们在研究相对较短时期内的个体行为时，可以暂时将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悬置”起来，以使问题得到简化。但是必须认识到由此得到的结论的局限性，它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具有不同的具体意义，并且要放置到社会关系的历史运动中才能得到深层的理解。同样，当我们研究相对较短时期宏观经济的再生产流程（以货币流量为核心）时，我们同样可以将支配货币流量的社会关系力量“悬置”起来，以使问题得到简化。但是，同样必须认识到由此得到的结论的局限性，考虑到社会关系力量对它们的长远影响，只有如此才能得到既能处理当下问题，又有长远历史眼光的科学决策。因此，三种经济学理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各司其职，相互参照。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根本性、长期性影响的战略决策，则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因为它是关于社会经济系统的深层机制的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逐渐将这三种理论的三大不同的研究领域逐步统一起来，逐步形成统一的经济学理论，它是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系统客观规律的全方位理论。

注释：

①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3 页。

②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廉运杰译，华夏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1 页。

③刘厚俊：《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 页。

④K. J. Arrow、G. Debreu：Existence of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1954，22.

⑤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第二版）》，颜鹏飞总译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41 页。

⑥⑧⑨⑪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1 页、第

30 页、第 106 页、第 22 页。
⑦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 1 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428 页。
⑩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巫宝三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9—10 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02—103 页。
⑬⑲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7 页，第 56—57 页。
⑭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22 页。
⑮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4、156、187、385、386、659、825、847、860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3 页；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0、217、293、378、425、429、534、922、934 页。
⑯⑱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7 页，第 107—108、106 页。
⑰㉑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2 页，第 62 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1 页。

Basic Problems and Thought Genealogy of Economics
——The Essence and Relationship of Three Paradigms of Economics

LU Pin-yue, WANG Jing-song

(*Research Center of Modern Economic Philosoph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standpoints will bring about different basic problems of economics, thus discovering different economic mechanisms and creating different paradigms of economic theories. The study 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sire and resources based on individual economic behaviors finds equilibrium mechanism of marginal interests and gives birth to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e study on the condition of reproduction process issues finds a money-flow mechanism, and gives birth to Keynesian economics. The study on origin and essence of power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market economy leads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laws of capital's historical movement, and gives birth to Marxist economics.The three theoretical paradigms make up the thought genealogy of modern economics and shou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Among them, Marxist economics reveals the essence of economic phenomena.

Key words: basic problem of 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 theories; economic machanism

（责任编辑　金　澜）